

专题：中美关系迈向“新冷战”？

美国、中国和冷战类比

邝云峰

内容提要：在近年来所有被认为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先例中，哪一个先例最具启发性？本文指出，冷战作为1947—1989年美苏两国围绕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是理解中美关系最佳的历史先例。不过由于类比论证常常是一项带有冒险性的智力工程，因此有必要以当前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来“检验”从冷战1.0类推出的若干结论。本文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进行这类检验的建议。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 中美关系 冷战 历史类比

“一个人必须经常思考历史先例——我们都是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塑造的。”

——迪安·腊斯克¹

一、导言

在近年来所有被用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历史先例中，哪一个是最具启发性的？本文指出，冷战作为1947—1989年美苏两国围绕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是理解中美关系最佳的历史先例。具体来说，冷战的类比强调了“大局”（big

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No. 2, 2019, pp.223-237)。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的授权许可。

1 迪安·腊斯克于1961至196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此处来源于作者于1986年对腊斯克的访谈，参见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icture)上的三个相似之处:当前(亚洲)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及由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核武器所创造的相互威慑条件。前两个相似之处表明,中美战略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的主旋律,第三点则表明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将受到限制。第二个类比,或许也是更具煽动性的类比是20世纪美国对英国的“和平赶超”。结合上述两个类比,我们可以推断出关于中美竞争的大致轮廓和轨迹的假设,这些假设能够也应该为未来几年逐步展开的事件所“检验”。

本文开篇谈到类比设问时,之所以讲“最具启发性”而非“最为恰当”,是因为所有的历史类比都是可疑的。按照定义,历史类比以语言启发式(linguistic-heuristic)的手段来强调两个不同实体或者事件之间的相似性。这意味着,尽管类比能够表明两个历史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它们“从来无法证明(prove),因为A和B在X方面是相似的,因此它们在Y方面也是相似的”。¹ 关注决策者如何运用历史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方法来缓解使用历史类比时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第一,着眼于增加可供参考的类比数量,而不是仅参考一种。至今为止,由于不同的类比提供不同的诊断和政策建议,决策者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他/她选择类比A,而不是类比B或者C来理解某一情境。² 第二,决策者也可以采用一些技巧,例如将类比中得出的已知内容与那些不清楚或者假定的内容区分开来,并检视给定问题的历史。这些技巧“专精”于某一特定的类比,能让使用者领会这一类比的优势和不足。³ 第三,有些人建议用类似于科学家验证其理论的方法,将类比推理用于实证或政策检验。⁴ 比如,如果冷战的类比导致我们预计中美之间的竞争将随着中国赶上美国而进一步加剧,那么,应该有可能设计出相应指标来衡量各选定领域内的竞争强度。

在探究冷战类比之前,有必要简要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不关注于另外两个著名的历史类比:一个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另一个是20世纪德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英国的恐慌。本文并不详述这两者的主要原因,美苏冷战竞争或者说“冷战1.0”同样展现了“大国兴衰”的动态,前面两个类比也发现了这一点。在《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书中,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深入探究了雅典—斯巴达类比,以此来理解日益增长的中美对抗的逻辑和危险。不过,他也同样令人信服地将美苏对

1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2 Ernest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Richard Neustadt and Ernest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4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p. 247-249.

抗描绘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¹

虽然承认雅典（崛起力量）—斯巴达（守成力量）的逻辑是理解当前中美竞争的关键，但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和今天的区别足够显著，以致这一类比虽颇具吸引力，但却值得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德英类比在时间上“更接近”今天的中美竞争，它同样也包括了崛起国家对抗既存统治力量的逻辑，在阐明中美竞争的各个类比中也算最有前途的有力竞争者。不过，有研究者质疑这一类比找错了对抗双方。陈思德（Steve Chan）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真正的竞争者是德国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和英国。根据他的研究，德国将俄国视为在20世纪必须与之竞争的崛起大国，德国在1914年发动的预防性战争的目标国正是俄国。² 另外，托马斯·鲍泰利（Thomas W. Bottelier）提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真正的权力转移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他认为，“德国从未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大国，而美国做到了”。³ 换言之，两人向那些指望使用一战类比的人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身份判定的问题。

二、两极的亚洲

较之一战类比，笔者更倾向于冷战类比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与国际/地区体系有关：欧洲在一战前是多极体系，然而今天的亚洲是两极体系，某种意义上与冷战1.0的结构背景类似。根据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2019年对亚洲25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测算，今天的美国是最为强大的国家（84.5/100），紧随其后的是中国（75.9），接下来是日本（42.5）、印度（41.0）和俄罗斯（35.4）。⁴ 中美两国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它们被归类为亚洲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s），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被划定为“主要大国”（major powers）。亚洲实力指数（API）的一个优势在于，尽管对硬实力（如经济和军事能力）赋予的权重最高（各17.5%），它也包含了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形的实力方面，如国家韧性（10%）、未来资源（10%）以及软实力/文化影响力（10%）。

更倾向于冷战类比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与国际/地区体系有关：今天的亚洲是两极体系，某种意义上与冷战1.0的结构背景类似。

1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 42, pp. 200-213, pp. 281-283.

2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51-62.

3 Thomas W. Bottelier, "Of Once and Future Kings: Rethinking the Anglo-American Analogy in the Rising Powers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9, No. 5, 2017, p. 752.

4 对洛伊研究所“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的更详尽讨论，参见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ownloads/Lowy-Institute-Asia-Power-Index-2019-Key-Findings.pdf>；以及 Yuen Foong Khong, "Power as Presti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1, 2019, pp. 119-142.

对那些认为经济和军事实力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的人来说，亚洲实力指数这一分析工具允许他们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如果硬实力的权重提高到30%，中美的综合实力仍将远超其他国家。认为中美是亚洲唯二的超级大国这一观点，是断言今天的亚洲是两极体系的基础。关注亚洲是必要而且合理的，因为亚洲（更具体地说东亚）将是中美竞争主要的竞技场。罗伊研究所的研究还表明，中国正在逐步逼近美国，权力转移已经开始。

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论证的，结构设定了国家行动的基本参数，虽然结构并不能决定国家的选择。在两极的世界中，一国的对手显而易见，那就是另一个超级大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收益被视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损失。同盟很重要，但一国以内部力量来抗衡外来竞争的努力更为关键（因为担忧盟友的可靠性）。¹因此，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指控日本、德国等国在安全问题上“搭了美国的便车”，以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是两党共识并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仍将持续存在，与亚洲的两极预期都是连贯一致的。

三、冷战1.0与中美关系：一些相似之处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Heng Swee Keat）对中美冲突及其根源做出了最简洁的评估。王瑞杰指出，“这是两个主要大国（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就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展开的战略竞争……这也关乎中美治理体系的差异以及各自社会如何组织运转，这些都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²

把“中国”换成“苏联”，上述描述同样适用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将冷战期间的美国视为“守成大国”，将苏联视为“新兴大国”，这是一个似乎完全合理的观点，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于此。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苏联描述为新兴大国，将美国描述为守成大国；而且这一观点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美国的遏制政策旨在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延伸至美国拥有霸权的地区。关于竞争所包含的其他要素——全球领导力、不同的治理体系、社会安排，王瑞杰的评估同时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冲突和过去的美苏冲突。

换言之，冷战类比对认识当前中美竞争的危險和根源颇具启发性。回顾美苏为争夺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而展开的竞争，以及两大阵营为力证自身的经济和治

1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pp. 169-176.

2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DPM Heng Swee Keat at the ST Global Outlook Forum," November 22, 2019,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DPM-Heng-Swee-Keat-at-the-ST-Global-Outlook-Forum>, 2020-01-17.

理体系及社会组织的方式更胜一筹而做出的努力,便能明白这点。冷战期间的此类事件乃至危机不胜枚举,包括马歇尔计划、美苏军备竞赛、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航天局的阿波罗计划、赫鲁晓夫吹嘘“埋葬”美国、古巴导弹危机、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1973年赎罪日危机以及苏联的开放性与改革政策,等等。尽管美苏都把重点放在匹配彼此的军事实力上,它们也非常清楚并高度投入于巩固自身优势的根源——政治—经济体系、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最终,美国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使得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分析人士得以在自由民主胜利之时宣告“历史的终结”。

尽管尚处于萌芽期,在当前的中美竞争中,相似的作用方式和逻辑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21世纪初,艾利森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向可能是亚洲最敏锐的中国观察家李光耀(Lee Kuan Yew)先生发问,中国是否渴望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或者世界头号大国,李光耀的回答是:

“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已经通过经济奇迹将一个贫困的社会转型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希望同美国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是中国的计划。所有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邻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将此考虑其中。”¹

亚洲内外与中国对话的各方都感受到了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展现出来的新的自信。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笼罩神圣光环的西方金融机构,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却相对未受影响。中国学者赵明昊关于中国对中美冲突认知的分析表明,2008年是中国的一个心理转折点。²换言之,西方的金融危机令中国官员和学者意识到,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能够考虑同美国平起平坐,并且甚至可能在未来超越美国。这种理解同样也有助于解释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更为积极主动、创新和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试想中国在南海九段线的主张;在有争议的岛礁进行建设;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创建新的经济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以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BRI),这些举动确实是一个自信并且准备挑战地区守成大国的崛起国在行为上的表现。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如理查德·贝茨³(Richard Betts)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⁴(John Mearsheimer)早已意识到,美

1 Graham Allison, et al.,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p. 2.

2 Zhao Ming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 3, 2019, pp. 371-394.

3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 3, 1993-1994, pp. 34-77.

4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396.

国如要保持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就有必要对华采取遏制战略。

诚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绝非无所事事。享受着作为单极大国的特权，美国致力于巩固自己的首要地位，给予其亚洲盟友（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北约盟友般的地位。比尔·克林顿政府和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扶植了印度和越南，这两个亚洲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为担忧。基地组织对美国的“9·11”袭击迫使美国在战略上和军事上集中注意力于中东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阻止了美国对东亚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给予充分的关注。有些人认为美国对“9·11”事件的回应（资战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礼物。守成大国美国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精力分散，而崛起大国中国却开始行使自己的特权。如果不是由于美国本土遭遇恐怖袭击，以及由此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可能在早些时候就会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及其含义。

美国赢得了冷战1.0（所幸没有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它的对手则被极大地削弱，并且不得不在冷战后的漫长岁月中舔舐伤口，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少有人会反对哈维·萨波尔斯基（Harvey Sapolsky）对美国过去和现在全方位军事优势的分析。他认为，军事优势是第一次冷战的特征，也将是第二次冷战的特征。美国在配置和动员资源以保持其军事和技术优势方面具备独特的能力，这意味着美国将难以被击败。¹如果在第二次冷战中，中国（这里暂且不考虑俄罗斯）主要发起的是军事方面的挑战，那么前述说法则确凿无疑；但是笔者对此持有异议。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技术和观念等各个方面。

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通过充分利用（parlay）军事资源来获得所期待的政治结果？²美国的军事优势是否使其从在亚洲（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在中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作战中获得了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仍有待商榷。如果冷战2.0的特点是包括诸多强有力因素——核威慑、经济相互依存和反对大国战争的规范（阻止中美卷入重大的军事对抗），那么经济、技术和观念层面的竞争将更具决定性。因此，罗伊研究所的亚洲实力指数给予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同样的赋值，并且将六个其他因素（国家韧性、未来资源、外交影响力、经济网络、国防网络以及文化影响力）包括在内，形成对亚洲25国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这一路径似乎是更为综合地理解亚洲地区的安全竞争的方式。根据亚洲实力指数，中国在四个指标（军事资源、国家韧性、国防网络和文化影响力）上落后于美国，但在经济资源（以购买力平价

1 Harvey M. Sapolsk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Second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9,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19-00021-y>.

2 Joseph Ny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215-217.

计算)、未来资源、外交影响力和经济关系等方面领先于美国。¹

在冷战1.0中,美国仅遭遇了单维(军事)超级大国苏联的挑战;在冷战2.0中——如果它将发生——美国将面对作为多维大国的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实力仍是军事实力(以及绝大部分罗伊指标)的根本基础,因此它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将确实不可能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但是,如果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超过美国,那么在冷战2.0的进程中,它甚至将比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决策者带来更大的士气,给予中国决策者充分的信心以经济实力达成期待的政治目标。人们愈发意识到,在诸如超级计算机、机器人、人工智能(AI)和5G/6G等领域争夺技术主导地位,将是冷战2.0的一个关键特征。中国在过去被视为技术落后者,不过考虑到目前中国在5G、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观点已经日益受到挑战。例如,李开复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比美国更占优势。²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制造2025》的反应等迹象来看,美国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技术挑战。因此,中国有理由认为,其经济和技术进步可以让许多东亚国家相信,中国是未来的潮流,是他们应该认真考虑与之结盟的超级大国。李光耀关于地区国家正在适应中国崛起的妙语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四、意识形态的竞争

当前中美竞争与冷战1.0的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笔者提到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连贯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理念的存在,这些理念能够引导一个社会实现其最终目标。在美苏的案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和(美国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包含关于政治行为、经济组织和理想社会的不同愿景。在中美的案例中,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概括术语,我们可将其理解为“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主张依赖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个人自由;“北京共识”则认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俄描绘为修正主义大国,两国的价值观与美国及其民主盟友所珍视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文件还专门指出中国意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因此,和冷战1.0类似,崛起大国对美国提出的挑战既包括权力方面的挑战,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这两个因素相互促进,并加剧了这场竞争的风险。至于中国,其发起的挑战甚至更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不同于苏联,中国

1 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2019,” pp.4-21,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ownloads/Lowy-Institute-Asia-Power-Index-2019-Key-Findings.pdf>, 2020-01-17.

2 Kai-Fu Lee, *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和冷战1.0类似，崛起大国对美国提出的挑战包括权力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加剧了竞争的风险。中国发起的挑战更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不同于苏联，中国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似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

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似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它使得7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且帮助中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以至于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

五、核威慑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核因素的显著性。尽管美国的核武库远超中国，但是中国拥有可靠的核力量，足以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的条件及战略核稳定。因此，中美核态势同样与冷战1.0的情况相似。不过，当前中美竞争中存在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代理人战争的问题。在冷战1.0中，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同对手的代理人作战。尽管代价高昂，代理人战争仍被广泛视为有助于转移超级大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当今亚洲最为明显的热点区域却缺乏代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如因台湾地区要求法律上的独立）、或者中国和菲律宾（如因南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进行军事干预，以帮助盟友。如果美国介入，中美两国军队将卷入战争。换言之，冷战2.0可能不仅成为“热战”，而且两个超级大国可能直接卷入其中。我们还不清楚中美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升级这种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具体状况以及相关决策者的个性（比如，他们展现出“决心”或者保持“可信度”的欲望）。鉴于核形势的水晶球效应，双方都不会允许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一场真正的核对抗。

六、冷战1.0与冷战2.0的区别

除了上述讨论的代理人情形，冷战1.0和冷战2.0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安全结构方面。在冷战1.0中，美国 and 苏联形成了军事同盟来威慑对方。相比之下，在冷战2.0中，美国的联盟体系仍旧维持在欧洲和亚洲，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盟友。这一差别对中国应对冷战2.0的路径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将优先考虑非对称的军事战略，如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另一方面，取决于北约在何种程度上追随美国视中国为军事挑战，中国有可能出于威慑的目的与俄罗斯结盟。

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还有两个其他的不同之处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中美经济之间深度的相互依存，二是中国挑战的不同属性。不同于缺少代理人的困境将增加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这两个差别很可能减少中美发生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在过去20年内，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经济的相互交织无疑是当前中美形势与冷战1.0最为显著的区别。美国和苏联的经济

联系被有意切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苏竞赛是关于谁的经济组织乃至国际交往的形式将被证明是更胜一筹的。相比之下,中美经济深度地(有人称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反过来,这两个经济体又通过供应链与众多其他经济体联结在一起。人们常说,苹果手机在美国设计、在中国组装,但除此之外来自六大洲41个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也参与其中。¹

政治学家们极为重视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认为它为国家提供了不通过战争来解决冲突的强力动机。“强劲的经济相互依存等于和平”的主张是有争议的,部分原因是经济相互依存并没有阻止德国和英国在一战中彼此为敌。对这一观点的改进则更具说服力,特别是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的观点,他指出对未来贸易和投资的预期是阻止战争的关键。这一观点上的改进指出了经济相互依存在哪些条件下更容易导致和平。²今天的经济相互依存包括多元供应链,因此从持续贸易中获得利益的经济体的数量也得以增加,这意味着冲突的发生有了更高的门槛,因为来自更多行为体的更大压力能够促使政治家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但是随着中美地缘竞争升温,两国的经济联系正面临着威胁。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动贸易战,以国家安全名义升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拒绝向在美国学习科学和技术的中国学生发放签证,以及将中国公司加入黑名单,似乎都表明美国正在开始有意采取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政策。³有人将此称为“相互依存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美国指责中国通过不可接受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获取了不公平的收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收益可能使得中国比美国更强大。正如特朗普在2018年8月所言,“上任之初,局势正朝着中国在短时间内将比我们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⁴中国经常反对美国的“冷战思维”,其言下之意在于,只要抛弃这种思维,那么双边关系就能保持平稳。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其引发共鸣的文章《即将到来的中美百年冲突》中,质疑了特朗普通过“控制中国或者同中国分离”来试图

1 Magdalena Petrova, “We Traced What It Takes to Make an iPhone, from Its Initial Design to the Components and Raw Materials Needed to Make It a Reality,” *CNBC*, December 13,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2/13/inside-apple-iphone-where-parts-and-materials-come-from.html>, 2020-01-17.

2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3 Rana Foroohar, “Consciously Decoupling the US Economy,” *Th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f23d8854-11fa-11ea-a225-db2f231cfeae>, 2020-01-17.

4 Ana Swanson and Alan Rappeport, “Chill Remain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Latest Trade Talk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23/us/politics/us-china-trade-talks.html>, 2020-01-17.

“维持4%人类的支配地位”的合法性。¹在极端情况下，中美的经济脱钩和分歧将把两国推回类似美苏关系的境地。从抑制军事冲突的角度来讲，这并非是一种有益的发展。

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在《大西洋月刊》等中明确指出，当前中美竞争与冷战1.0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发起挑战的性质不同于苏联。在冷战1.0期间，美国担忧的危险是苏联控制欧洲主要工业中心，这将使得苏联可以“缓慢地积聚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从而能对美国发动旷日持久的斗争”。²美国希望避免与苏联持久斗争所带来的国内影响，因为这将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军事管制国家”（garrison state）。相比之下，中国今天在亚洲发起的挑战并没有那么令人生畏。中国没有能力或意图来“吞并”（absorb）亚洲的主要工业中心或“聚合它们发动战争的能力”来对抗美国。莱夫勒指出，“今天的中国周边环绕着富裕且自傲的日本、坚韧且充满民族主义的印度……还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韩国。中国的机会并不多；事实上，中国受到重重制约”。³而且，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交织，这是美苏之间从未有过的情况。

莱夫勒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分析让他最终得出结论，使用冷战类比来“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不合适的”。有趣的是，莱夫勒在文章结尾处引用了一个更为遥远的类比来思考中美关系：

“要理解中国，仅需回顾我们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那段历史。在那些年中，美国毫不留情地强迫英国在北美做出海运和渔业方面的让步。美国强调，伦敦应该就争议领土与委内瑞拉进行仲裁，并且重新谈判那些将英国排除在中美洲运河区域之外的协定……华盛顿期待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和不断增加的实力给美国带来相应的尊重……反思这段历史，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行动背后的推动力，并且应该审慎地对此做出评估。”⁴

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类比，但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类比。美国崛起的叙事将崛起中的美国（19世纪90年代）与崛起中的中国（21世纪）在各自周边地区的强势行为进行了类比，以理解崛起中的大国如何行事。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结果在20世纪20年代和平地取代了英国。莱夫勒是否认为在中美之间存在中国和平超越美国的可能性？这点难以断定，因为莱夫勒本人并

1 Martin Wolf, “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4,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52b71928-85fd-11e9-a028-86cea8523dc2>, 2020-01-09.

2 Melvyn P. 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 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The Atlantic*,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 2020-01-17.

3 Melvyn P. 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 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4 Ibid.

没有明确地谈到。但是,如果他确实援引“美国和平超越英国”的类比来预测中美竞争的最终结果,他不会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当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一流的战略思想家主张离岸平衡战略时(如将美国大部分军队调回国内),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建制派可能会意识到,美国公众厌倦了持续地为外国承担安全保障的责任。¹当特朗普谴责美国盟友“搭便车”,要求盟友为美国的保护支付更高代价,并威胁如果盟友拒绝则撤回美国军队时,特朗普将这种厌倦感和怨恨的情绪结合在了一起。换言之,美国正在重新评估维持霸权地位的代价。其他国家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2015年,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对40个国家的民众展开调研,询问他们对中国是否“不会取代美国”,或者“将/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看法。调研发现,27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将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²

七、检验类比推论

如上关于美苏冷战和当前中美关系相似性和不同之处的分析表明,尽管远非决定性因素,美苏冷战确实为当前中美关系提供了貌似合理的推测。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我们能够在美苏冷战和当前中美关系的状态和发展轨迹中发现相似之处。这似乎违背了莱夫勒对重新采用冷战类比来“框定当前中美关系”的警告。莱夫勒的警告需要被认真对待,因为他的警告基于深厚的历史造诣,且敏感地注意到国内政治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家经常忽视的一点。³不过,关于历史类比可适用性的争论不可能通过找到更多的相似性或者非相似性来解决,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些最终最为重要或最具决定性。我们大体上还处于有根据地进行猜测的范围内。

评估哪个类比推论或者有根据的猜测更为合理的一个方法,是去“检验”它们,更精确地说,去检验它们可观察的结果。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可能有助于澄清这里表达的意

评估哪个类比推论或者有根据的猜测更为合理的一个方法,是去“检验”它们,更精确地说,去检验它们可观察的结果。

1 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 70-83; Christopher Layne, “The Sound of Distant Thunder: The Pre-World War I Anglo-German Rivalry as a Model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 Asle Toje, ed.,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79-202.

2 Pew Research Center, “Balance of Power Report,” June 23, 20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5/06/23/2-views-of-china-and-the-global-balance-of-power/>, 2020-01-17.

3 Melvyn P. Leffler, “Avoiding Another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9,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19-00027-6>.

思。在那场导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决定在越南作战的争论中，有些人（如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认为美国可能会赢，正如美国在朝鲜取得胜利；不过还有些人〔如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认为美国将会失败，如同1954年法国输掉奠边府战役。鲍尔撰写了备忘录批评朝鲜战争类比，指出奠边府战役的类比更为恰当。鲍尔似乎意识到类比推理无法解决这场争论，于是他向约翰逊总统提议，可以派遣美军在越南作战3个月，如美国战败则从越南撤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另一种类比的准确性。美国的国内政治是否允许约翰逊进行这样的现实测试，即按照鲍尔的建议用美国人的生命进行试验，当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不进行鲍尔所建议的测试，意味着约翰逊总统在持久且最终无法获胜的越南战争中，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性命，更不必说葬送了自己连任的前景。¹

那么我们怎样来检测冷战类比对理解当代中美关系的合理性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冷战2.0在未来十年中可观察的具体结果。冷战类比引导我们想到如下三点：（1）中美战略竞争起初是在东亚地区、长期来看则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影响力和领导地位的竞赛；（2）伴随着重重危机，中美竞争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更加激烈；以及（3）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将保持冷战的状态。

观察结果（1）是关于竞争的本质和发生地点。今天的美国正在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是与其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中国在过去40年中爆炸式的成长使其综合实力超过亚洲的所有国家，而且中国正在步步逼近美国。亚洲是一个两极的结构。美苏竞争的核心舞台是欧洲；而中美竞争的核心舞台将是东亚。美苏竞争持续了40年；中美竞争也将是一场长期的较量。对此，马丁·沃尔夫预见中美之间是“百年”冲突。²

在检测这一推断的洞察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问，中国是否已经开始像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那样行事，中美竞争的舞台是否就是在东亚，以及中国是否以长远的视角来看待中美竞争。基于对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行为判断，上述问题的初步回答都是肯定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张和行动，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新机构，积极介入特朗普政府不作为的多边领域，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在东亚内外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当然将以上绝大部分行动视为挑战。不然还有其他理由让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下）试图劝阻英国加入亚投行，与日本和印度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以及在2019年增加在南海和东海的自由航行行动（FONOPs）吗？不过，如果未来中国回归到2008年之前的行为

1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p. 247-250.

2 Martin Wolf, "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

方式——“韬光养晦”，重新考虑“一带一路”倡议，放弃九段线的主张，将地区关注从东亚转至非洲，那么按冷战1.0方式进行的两极竞争的预期，在解释中美互动上将似乎不那么有用。

观察结果(2)预期中美竞争将加剧，并不时出现危机。如果以美苏冷战为参考，那么由于双方通过对抗、危机和代理人战争来探路，冷战2.0的第一个十年将尤其令人担忧。在美苏案例中，美国在1947年对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担忧催生了“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宣称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蔓延。美苏冷战第一个十年中的其他标志性事件还包括朝鲜和越南的代理人战争，前者被视为苏联怂恿的，后者被视为得到了中苏的支持；“导弹差距”；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还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由于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几乎走到核战争边缘（据约翰·肯尼迪总统称，美苏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发生核冲突），两国猛然醒悟，开始创建机制和协定来管理它们的战略竞争。两国创建的机制包括可以让美苏领导人直接沟通的电话热线；协定则如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特朗普政府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两份文件，尽管没有“杜鲁门主义”那么引人注目，不过也可能达到了相同的效果：这两份文件将中国认定为美国势均力敌的主要竞争对手。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直言不讳地提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利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威胁其周边国家，同时军事化南海地区。”¹一句话将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区挑战做了简洁的概述。美国在过去两年中的行动与一个主导国对所感知到的挑战的回应是相符的。基辛格评论中美正处在冷战高峰前的“山麓”(foothills)，这一说法似乎很贴切。²

中美已经从美苏经验中认识到，在两个超级大国就管理竞争的机制和方式达成一致之前，应避免经历相似的危机情况，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情况。当东亚和欧洲国家对受到来自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要求它们“选边站”的压力表达担忧时，这表明它们并不想陷入两极格局固有的安全机制中。另外，如果近期平息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之后，绝大多数对华制裁随之迅速解除，始于特朗普政府的中美经济脱钩在美国2020年大选后停下来，中国企业华为所涉问题得到友好解决，并且鲜有危机情况发生，那么冷战类比在理解中美关系发展轨迹方面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了。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1,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4356780-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html#document>.

2 Bloomberg News, “Kissinger Says U.S. and China in ‘Foothills of a Cold War’,” November 21, 2019, <https://www.bloomber.com/news/articles/2019-11-21/kissinger-says-u-s-and-china-in-foothills-of-a-cold-war>, 2020-01-17.

尽管中美两国的竞争持续、激烈且危机四伏，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这是根据冷战经验推断出的观察结果（3）的预期。虽然新的中美竞争中不能忽视那些令人痛苦的时刻，如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升级美国的战略态势以警告苏联介入阿以战争，但是人们还是期待冷静的头脑将占据上风。另一个避免陷入战争的关键因素是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相互依存。这在美苏关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应该都有着强烈的动机，避免从根本上打破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特朗普政府选择性地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从避免暴力冲突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负面的做法。

八、结论

文章开篇提到迪安·腊斯克关于决策者通过经历过的历史事件来理解当下面对的挑战的陈述。心理学家将此称为“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意思是我们倾向于回忆那些我们最先想到的事件。尽管有很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系紧张，中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问题上几乎走向对抗，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这些事件在时间上都更接近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中美竞争，不过它们都不如（美苏）冷战类比更具启发性。对今天的决策者来说——即使是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冷战的决策者，后者确实是最明显且“最易获得”的用以理解中美竞争的类比。无论我们是处于冷战高峰前的“山麓”，或是距冷战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都有必要谨慎地使用这个类比。本文试图强调美苏冷战与当前中美关系状态的一些相似之处和重要差异。我们从这些相似及不同之处中得出的推论在智力上是诱人的，不过这些推论远非是结论性的。我们需要用不断展开的中美关系的经验现实，对这些推论进行持续不断的检验。

（崔志楠译；李卓、曾楚媛校）